當代社會工作學刊
第十一期 頁 1-3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Work
No.11, pp.1-32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https://reurl.cc/kd8EpG

網路性誘拐—兒少影像性剝削實務挑戰*

廖美蓮**

*本篇論文為科技部補助之「影像性剝削兒少被害人處遇研究：發展反歧視社會工作實務模式」（計劃編號：MOST107-2629-H-031-001）研究計劃書改寫而成，感謝科技部補助研究經費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精闢指出的修正意見，作者由衷感謝。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miriamliu@gm.scu.edu.tw

摘　要

網路性誘拐，為目前全球最受矚目的性侵害合併性剝削議題，對性剝削保護網絡工作帶來極大的衝擊。當前數位通訊軟體於日常生活普及的同時，也助長了犯罪。智慧型手機內建相機、易於上網，結合大量線上社群參與者，成為性騷擾、性勒索、性虐待、性剝削等性暴力的現成平台。影片與照片等影像能夠輕易地產生、上傳與下載，一旦散布到網路上，便極難移除。各種平台推波助瀾交換非自願、甚至遭脅迫而產生的私密影像，成為當前兒少性剝削防制網絡成員在處遇上的新挑戰。由於學界現階段對影像性剝削議題的增長速度、成因，及其對兒少與其家庭的衝擊與影響的研究還在起步階段，所知仍極有限。有鑑於此，作者檢索並整理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歸納，介紹網路性誘拐相關概念，聚焦日益氾濫的「影像性虐待/剝削」在國家治理上的政治性，並以女性主義理論為核心視角，分析女人與科技的議題，論證當前科技為男性霸權的延伸，關注科技所帶來不公平社會關係。本文主要分成六部份，除前言與結論外，正文有四：第一、科技打破對性暴力的理解；第二、網路兒少影像性剝削的內涵與歷程；第三、性別化網路平台與父權共謀；第四、數位化性暴力實務的挑戰。

關鍵詞：科技助長性暴力、影像性剝削、網路性誘拐、性勒索、數位科技

Online Sexual Grooming—Challenges of Child Image-Based Sexual Exploitation

Miriam Mei Lin Liu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taking selfies or photos of each other and other kinds of real-time interactions in video software, which are related to sexual violence, sexual abuse and sexual online grooming, have huge impact for protection of sexual exploit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not only spreads among normal lives, but also in daily crimes. Camera phones and users in social community are ready-made platforms for sexual harassment, sexting and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increasing spread of image-based sexual exploitation/abuse in political aspect. Due to the convenience of making, uploading and downloading photos and videos, and the difficulties to remove videos on the internet, these platforms help to exchange unwilling even threatening videos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easily. Overall, it's a new challenge for prevention of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Since we now know little about the growth and causes of image-based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its impacts and affects on child and youth and their families, the author review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sexual violence on the internet. Also, analyzing the issues of women and technology in a feminism perspective, to prove the technology now is "male technology". These are four main themes in this article. First is the cybercrime of image-based sexual violence in the use of technology. Second is the feature,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 of online sexual grooming. Third is the gendered online platform collaborates with the patriarchal collusion. The last is the professional challenges on digital sexual violence, rethinking the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image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 It's all about relationship education.

Key words: technology 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child image-based exploitation, online sexual grooming, sextortion, digital technology

壹、前言

資訊通訊與網路科技的發達，引發越來越多網路性犯罪問題，加害人易於利用數位技術（digital technologies）做為對兒童[1]性虐待與性剝削的犯罪工具（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2015），他們鎖定未成年兒童少年（以下簡稱兒少）為主要誘拐對象，造成不計其數的網路性剝削/虐待被害者。不論發生兒少性剝削還是性虐待，抑或兩者兼有，也不論暴力的形式是針對生理或心理的（ECPAT International & ECPAT Luxembourg, 2016），皆統稱（umbrella term）為兒少性暴力（Child sexual violence）。實證研究指出，家庭暴力、網路跟蹤與騷擾[2]（cyberstalking）（Woodlock, 2016）、約會暴力[3]、兒少性剝削[4]和影像性虐待/性剝削[5]（image-based sexual abuse/sexual exploitation）（Powell & Henry, 2017）與親密關係暴力（Freed, Palmer, Minchala, Levy, Ristenpart & Dell, 2017），都是性別與科技生成的性暴力[6]類型。若以臺灣兒童少年性剝削案件的服務統計量為例，檢視個案的性別差異，不難發現被害人以未/成年女性占多數；若進一步分析被害人遇害類型，近兩、三年遭受性剝削的樣態轉向以網路結合數位的非接觸式（non-contact）性剝削，比諸傳統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實際接觸式性剝削案件案量更高，型態也愈加複雜與千奇百怪（衛生福利部，2019）。

研究者透過長期參與政府與民間機構的研究計劃、機構外部督導工作或教育訓練的觀察[7]經驗與資料得知，網路性剝削這種在臺灣新興的性暴力犯罪模式

---

[1] 兒童的定義是依照兒童人權公約的定義，即 18 歲以下之人。

[2] 探討家庭暴力、網路跟蹤與騷擾與科技的實證研究(Sheridan & Grant, 2007; Spitzberg & Hoobler,2002，引自 Powell & Henry, 2017)。

[3] 研究約會暴力與科技的關係(Stonard, Bowen, Lawrence, & Price, 2014; Zweig, Dank, Yahner, & Lachman, 2013，引自 Henry & Powell, 2018)。

[4]探討兒少性剝削與科技的實證研究 (Martin & Alaggia,2013; Mitchell, Jones, Finkelhor, & Wolak, 2012，引自 Henry & Powell, 2018)。

[5] 也稱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ography）（Powell & Henry, 2017）。

[6]「性暴力」是一個涵蓋所有的詞彙，包括任何性行為、企圖得到的性行為、不受歡迎的性評論或性侵犯、販運、以脅迫手段的性行為（任何人，不論與受害者的關係為何），在任何情境下，包括但不限於住家和工作場所 (WHO, 2002:149)，關於「性暴力」一詞廣泛為學術界、專業人士及受害者所使用，不僅視暴力為身體上的傷害行為，同時衍生心理及社會問題。例如，強暴可能不會對受害者的身體造成直接的傷害，但可能造成持久的生理、心理及社會或經濟上的傷害。

[7] 實務現場的觀察是指研究者 2016 年度在新法三讀通過後，衛生福利部（以下稱衛福部）首先委託台灣展翅協會執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專業發展計畫」，展翅協會邀請我擔任計劃主持人，負責研發「兒童少年家庭功能評估指標」及撰寫新法工作手冊。之後，衛福部保護司於

尚未成為熱門議題，未受積極的重視與討論，基層社會工作者對此類性剝削案件並不熟悉，不免低估其對兒少的傷害[8]（廖美蓮、陳逸玲，2017）。在臺灣，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以下簡稱為兒少條例）修法屆滿半年後的第一個暑假，發生本國首起（三立新聞網，2017 年 5 月 22 日）網路性剝削案件，加害人以假身分透過聊天室、交友應用程式（APP），誘騙 121 名未成年兒少拍攝包括裸露等私密照片後，透過網路平台分享及散播，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年僅 8、9 歲（胡欣男，2017 年 7 月 31 日）；另外尚有其他網路性剝削案件，如一名 21 歲男子以 300 點線上遊戲點數誘騙國中少女自拍全裸自慰影片，再透過手機通訊軟體傳送（ETtoday 新聞雲，2017 年 12 月 22 日）；以及近期震驚全球的南韓 N 號房事件，從 2018 年到 2020 年間，這一系列犯罪影片的觀看流量竟然高達 26 萬人，其中受害者最年幼的才 11 歲（周怡霏，2020 年 3 月 25 日）。在臺灣，網路性剝削加害人會以違反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兒少性剝削防制網絡社工以「213」簡稱之）：「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以及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以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電信、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散布、傳送、刊登或張貼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使兒童或少年有遭受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之虞之訊息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移送法辦。前述的性犯罪類型就是當前數位時代（digital age）下受到高度關注的新興犯罪手法，也是典型的數位化性暴力事件。有鑒於兒童及少年於使用網路數位科技與社交軟體遭性誘拐導致性虐待/剝削等傷害的現象日益嚴重，值得國內相關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者進行探究與分析。本文旨在探討網路兒少性誘拐（online child sexual grooming）案件中的兒少影像性剝削議題，拋磚引玉，希望可見的將來即有更多研究發現與結論出現，對目前網路科技助長的影像性剝削的性暴力事件提出有助益的處遇，以及對預防網路影像性虐待/剝削保護政策制定提出有效建議。

2017 年度繼續邀請我擔任其委託展翅協會執行之「精進兒少性剝削防制工作巡迴督導」研究計劃主持人，分別與 22 個縣市的一線社會工作人員座談。同年 11 月並隨保護司到英國參加性暴力防治國際交流研討會，實地到英國八個核心負責兒少性虐待與性剝削防制之機構交流。2018 年度繼續擔任衛福部保護司委託展翅協會執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被害人後續追蹤評估」研究計畫的主持人，評估與勾勒臺灣當前後續追蹤服務的工作模式與建置較理想的工作藍圖。

[8]「傷害（harms）」一詞，包含某些不被法律視為犯罪或錯誤的行為。雖然這個名詞廣義且不具體，但卻能包含或整合受害者所受到的生理、心理、社會或經濟上的傷害。此外，該名詞也隱約地承認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被同樣的行為傷害。

貳、科技打破對性暴力的理解

數位科技時代下，行動裝置普及，網路連接起人與人的連繫與互動（Hertlein & Ancheta, 2014）。當網路已成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享受網路便利的同時，也出現許多使用網路的安全議題和新興的犯罪手法，大量線上社群參與者，成為性騷擾、性虐待、性剝削與性暴力現成的平台（Marganski & Fauth, 2013；廖美蓮，2018）。由此可見，這些虛擬的溝通平台，讓心懷不軌者容易且快速地結盟他人共同霸凌兒少、在線上騷擾（cyber harassment），或在個人檔案上張貼惡意圖片或色情訊息（sexting）等，造成當前各個年齡層的女性面臨巨大風險（Gillespie, 2002; Melrose, 2013; Kloess, Beech, & Harkins, 2014; Hayes & Unwin, 2016; Wolak, Finkelhor, & Mitchell, 2011）。

一、網路兒少影像性剝削在網路空間蔓延

2006年，澳洲一名年輕人錄製一卷DVD，內容為八名青少年對一名少女撒尿、火燒頭髮、將她的衣服丟進河裡、強迫她發生性行為等。這群人後來被以性侵害、製造兒童性虐待題材（child pornography[9]）、媒介性侵等罪名起訴（Medew, 2007 cited in Powell & Henry, 2017）。這個事件引起社會大眾及學者對於數位科技被應用到性犯罪上的高度震驚與關注，許多國外研究亦因此案．開始省思「數位影像科技」成為網路性暴力與其他性犯罪的幫兇（Adams, 2007; Bluett-Boyd et al., 2013; Dodge, 2016; Henry & Powell, 2015a, 2015b; King, 2011; Powell, 2010a, 2010b; Yar, 2012 cited in Powell & Henry, 2017；廖美蓮，2018；廖蓮，2019b），對受害人身心帶來傷害的問題。有關網路性暴力的定義分歧、多元，實務上也常碰到涉及傳送他人「與性相關的影像或文字」是由兒少本人發出，甚至也獲得金錢或其他物品的狀況，成為網路影像性虐待/性剝削事件應否揭露的一大難題。「科技助長的性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TFSV）最常見的態樣就是影像性虐待與網路性騷擾，影像性虐待又區分為 5 種

[9] Child pornography一般翻譯為兒童色情，但國際終止兒少性剝削組織（ECPAT International）提出此名詞具有污名兒童的意涵，應懂慎使用。色情主要用於成年人從事合意的性行為，而向公眾分發，以滿足公眾的性樂趣。「兒童色情」與「兒童賣淫」的使用似乎暗示兒童可以同意此行為，並且對此性題材給予合法化的基礎，故遭致批評。這個用語使用的轉變，是基於用來描繪兒童性目的的題材，實際上呈現的是兒童性虐待的形式，因而不應該以「色情」描述。「兒童色情」一詞愈來愈多以「兒童性虐待/性剝削題材（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material）」取代。

類型：關係報復、性勒索、性偷窺、性剝削與性侵害影像；網路性騷擾則包含4種型態：性引誘、強暴威脅、影像性騷擾與厭女仇恨言論等（Powell & Henry, 2017）（如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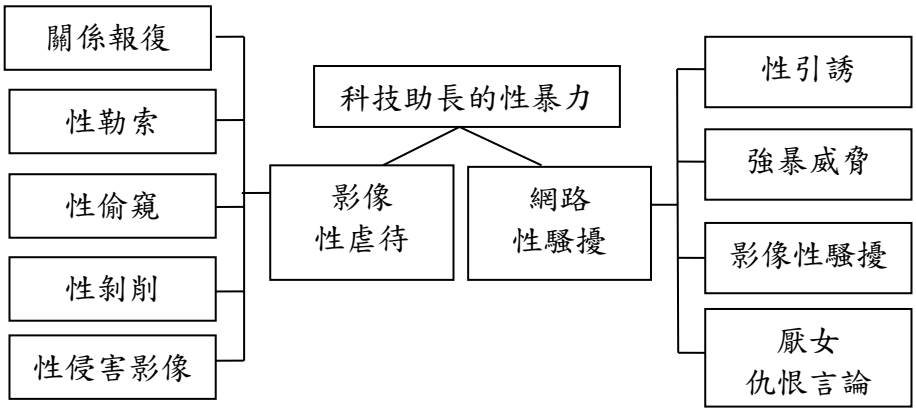

圖 2.1 科技助長網路性暴力的分類（Powell & Henry, 2017）

網路影像性虐待/性剝削（image-based sexual abuse/exploitation）是運用科技工具的性犯罪。研究指出，犯罪盛行率計算方式確定與影像性虐待的犯罪行為具相互關聯（Klettke, Hallford & Mellor, 2014），估算網路兒少性剝削盛行率取決於兒少對性剝削問題的覺察及認知，以及對支持系統的知識和系統執行的可行性，凡此種種都將影響通報率（Bryce, 2010）；此外，加害人也可能運用威脅、強迫的手段抑制事件揭露，犯罪黑數一直是網路性虐待最大的挑戰（Brackenridge Bishopp, Moussalli, Tapp, 2008），值得性剝削防制工作網絡成員的重視與積極關注。

何以網路成為影像性剝削/性虐待犯罪的溫床？Weiss（1973/1982/1989）及 Schultz and Moore（1989）等人分別指出：個人之所以會產生孤寂感，究其原因，可能源於缺乏歸屬感所導致的焦慮不安，因此難以抵禦社交網站與交友軟體的誘惑，尤其當網路的匿名友人既懂人心，又擅長利用人性來安慰人心時，等發現遭受傷害為時已晚。不同學者對影像性虐待/性剝削的分類略有差異，研究者採學者 Powell & Henry 之五種類型的影像性虐待行為（引自廖美蓮，2019a、2019b），分別說明如表 2.1：

表 2.1 影像性虐待/性剝削類型、內涵與特徵

類型	內涵	特徵
關係報復（Relationship Retribution）	又稱為復仇式色情，是最典型的影像性虐待，也是實務上常見的案例，通常是關係中一方同意被拍攝性親密錄影或照片，但二人分手或衝突後，拍攝方因心存怨恨並想報復情人或舊情人，未徵得被拍攝方同意便運用數位科技將其性私密影像在網路散播，作為侮辱、虐待和威脅對方的工具。	數位化、非接觸式
性勒索（Sextortion）	第二類是性勒索。這個新名詞衍生自數位時代，意指加害人擁有受害者的裸體或性愛的影像，藉由散播這些影像以脅迫受害者傳送更多影像。	數位化、非接觸式
性偷窺（Sexual Voyeurism）	第三類是性偷窺。有別於性勒索案件通常涉及勒索和企圖向受害者進一步索取更多私密影像，性偷窺是指沒有意圖讓受害者知道其私密影像被製造、分享或散布於網路上。	數位化、非接觸式
性剝削（Sexploitation）	第四類是性剝削。主要目的是使用非經同意的影像在網路進行金錢交易或販售，涉及性或色情影像對價。	數位化、非接觸式
性侵害影像（Sexual Assault Imagery）	最後一個類型涉及性侵害或強姦影像的製造和/或散布（包括威脅要散布），也有可能以此再脅迫影像的主角給予更多接觸式的性愛。	數位化、非接觸式

資料整理：作者參考 Powell & Henry（2017）資料再自行整理。

二、數位影像性虐待與性剝削之國內概況的整理

本文試著從研究主題、研究對象、暴力類型和研究方法（以量化研究為主）等，整理出近年國內以利用數位科技、網路性暴力為標題的相關研究（詳如表 2.2），藉以更了解當前臺灣對網路性暴力的概念、研究關注與研究策略的狀況，也有助於累積更多本土實務研究統計數據與資料。

網路兒少性虐待/性剝削的盛行率會因研究的定義不同而有所差距，研究指出每個人遭遇影像性虐待的終生盛行率為 8%（Eaton, Jacobs, & Ruvalcaba, 2017）。根據實務統計，部份親密伴侶可能出於自願拍攝性私密影像，亦有部分伴侶可能受到另一半的壓力而同意拍攝與分享，或是被迫拍攝、遭偷拍性私密影像（婦女救援基金會，2017；Henry, Flynn & Powell, 2019a）。

表 2.2 影像性虐待/性剝削相關研究整理

單位	年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台灣展翅協會	2018	2017 年 Web 885 網路諮詢熱線之統計報告	Web 885 網路諮詢熱線求助者	案件分析	在 195 件諮詢案件中，最高比例為性勒索案件，為 15.38%，被害人主要是被恐嚇威脅要散布其私密影像，藉此獲得金錢、維持關係或毀壞名譽，其中年紀最小的被害人為 15 歲少女。
台灣展翅協會	2018	青少年自拍認知及行為調查報告	青少年	採隨機抽樣，抽取六都學校，每一學校各一班級進行網路問卷調查	在 1,500 名六都的國、高中/職青少年中，裸露自拍的盛行率為 1.1%，0.5%的人曾傳送自身的自拍裸照、2.1%的人曾經傳送他人的自拍裸照、12.5%的人曾經收過他人傳送的裸露影像，有 1.2%的人會繼續轉傳。
婦女救援基金會	2017	對拍攝性私密影像的狀況及態度	有使用經驗的人	採便利抽樣，在各大網站、PTT、校園討論版發放網路問卷	在 1,138 位受訪者之中，有 21%的女性受訪者受害時為未成年。在性私密影像部分，4%的人曾遭受到恐嚇/威脅；而不論受訪者是否有遭受過恐嚇/威脅與否，有一成的性私密影像已經或疑似外流，其中八成五為女性。
兒童福利聯盟	2018	兒少交友 APP 調查暨網路交友離家現況	兒少	採分層多階層叢集抽樣進行問卷調查	在 1,889 位 12-17 歲的兒少中，接近八成六的兒少曾經有過網路交友的經驗，其中約四成的兒少曾使用交友 APP。6%使用交友 APP 的兒少曾被要求提供裸露照片或影片。

單位	年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2017	兒少網路行為調查	兒少	問卷調查	在 2 萬多名小五至高中的兒少受訪者中，有 2%受訪者的性私密影像外流。若以一個年齡層約 20 萬人估算，全臺小學五、六級生及國、高中生一共有 160 萬人，約有 32,000 名的兒少受害。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2019	兒少網路使用調查	兒少	問卷調查	在 25,069 名兒少受訪者中，約 4%的人曾在網路上談戀愛，2.8%的人曾被要求拍攝私密影像，0.3%的人傳送自身的私密影像，0.3%的人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被公開私密影像。

資料整理：研究者自行整理。

上述國內研究顯示，影像性虐待/剝削問題日益嚴重，加害人往往透過網路認識兒少，要求、恐嚇或威脅兒少提供性私密影像，或是被他人在未經其同意/知情的情況下散播至網路上，傳播速度快且範圍廣，要將影像全部移除的工作極為艱鉅，往往讓受害者身心俱疲。有鑑於此，如何深化性剝削防制網絡成員對網路性暴力犯罪手法的知識、杜絕科技性犯罪的技術，以及研究後續被害人的處遇策略等，俱為當前亟待思辨的課題。

參、網路兒少影像性剝削的內涵與歷程

對兒少進行線上性誘拐是一種應受法律制裁的嚴重性虐待與性剝削行為（Lorenzo-Dus & Izura, 2017），其中，兒少性剝削（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CSE）必定是包含對兒少性虐待（Child sexual abuse, CSA）的意涵（廖美蓮，2016；Jeglic & Calkins, 2016）。探究兒少影像性虐待/性剝削被害人，得先了解網路性暴力特徵與歷程，檢視網路性暴力被害人的傷害與數據。從衛福部保護司針對 2017-2019 年〈兒童性剝削案件辦理情形〉的統計數據看來，其中第三款，即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物品的案件分別為 581、

546、717 件，佔所有案件類型的百分比分別為 52%、44.8%、59.1%（2020 上半年的統計更突破七成）；在過去三年通報的案件中，其中分別有 589（2017）、445（2018）、796（2019）人次的加害人是運用網路進行犯罪，在在顯示出網路作用在兒少性剝削事件中的嚴重性（衛生福利部，2020）。以下從分兩部份進一步說明兒少影像性剝削的犯罪特徵與圈套式歷程：

一、非接觸式到接觸式的性暴力歷程

影像性虐待和性剝削包含性的暴力行為非常多樣化，如散播及消費兒少影像、騷擾等非接觸式及接觸式的性犯罪，通過隱密的性接觸到肢體暴力、攻擊，造成傷害甚至死亡（Jeglic & Calkins, 2016）。這個定義包含了身體上接觸式的行為如強暴（性器官的插入）、性侵害（不限定於性器官的插入），以及非接觸式的行為（如性騷擾或性脅迫）。利用科技的性暴力所帶來的傷害屬於「非接觸式」的攻擊（如復仇式色情以及線上性騷擾），雖然加害人沒有真的觸碰到被害人，但這並不表示實質的傷害就不會產生。語言充滿敵意以及散布照片等，都嚴重威脅受害者的身心，使其感到羞愧、自責、焦慮、抑鬱、失去對人的信任、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甚至讓被害人產生自殺的念頭（Bates, 2016; Henry, Flynn & Powell, 2019b），不可低估這些厭女與仇恨言論的力量和影響，以及其所代表的性暴力對被害人所埋下的危險因子。仇恨言論不僅導致物理的暴力（如種族滅絕），還會形塑個體的主體性以及經驗（Foucault, 1977）；Judith Butler（1990）提到這些攻擊性或有害的言論不僅貶抑個人的尊嚴，也建構出某種社會存有的可能性。許多研究[10]顯示 16-24 歲的年輕女性遭受網路性侵害的風險最高，加害人多半不是陌生人，而是熟識的男性，如男朋友、朋友、認識的人。

另一種非接觸式的性暴力是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性簡訊」（sexting）（Mitchell, Finkelhor, Jones & Wolak, 2012；Patrick, Heywood, Pitts & Mitchell , 2015）。性簡訊分為自願性與非自願性，自願性的性簡訊涉及人物 A 知情，也自願寄送自己的裸體或是性的圖像或影片給人物 B，但卻因為人物 B 想操控，或者不滿人物 A 而散播其照片（即關係報復）。相對地，非自願性的性簡訊通常是人物 A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其照片被人物 B 傳送給人物 C 或更多人，可以視為

[10]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3; Department of Justice (US), 2013;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K), 2013.

影像性虐待的同義詞（Henry & Powell, 2015）。有研究者創造新詞彙「強制性的性簡訊（coercive sexting）」，指一種非自願性手段，強調人物 B 施壓或脅迫人物 A「自願」製造和/或發送的裸體或性的圖像（Drouin, Ross, & Tobin, 2015）。一項國外針對科技與親密關係調查的研究指稱，18-54 歲的美國成年人（n = 1,182），每十名就有一名曾被前任伴侶威脅要在網路上公開其私密圖像，其中有 60%實際進行（McAfee, 2013）。

二、利用關係的網路性誘拐

成年加害人透過網際網路與兒少、高中、大學生網戀、誘騙或慫恿兒少參與性活動、利用 GPS 定位兒少被害人位置，使用多個帳號並偽裝成不同身分，待取得信任後再進行性侵害，未經同意或威脅惡意散布性私密影像或販賣性裸露影像。儘管網路影像性剝削的案例在全球持續增加，可惜當前對於網路性誘拐的研究仍為數不多（Lorenzo-Dus & Izura, 2017）。

影像性剝削是加害人透過關係對兒少網路性誘拐（child online sexual grooming）（Fox & Kalkan, 2016；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2015；Whittle, Hamilton-Giachritsis, Beech, & Collings, 2013）的過程，研究者在實務現場的案件討論中發現，被害的未成年人通常在依附關係中屬不安全依附或需求未被滿足類型（Howes, 2014），與家人或主要照顧的關係為負向或得不到家庭的支持與保護（Whittle, Hamilton-Giachritsis, & Beech, 2013），故而必須轉向在其他地方尋找依附，而網路世界就變成是兒少最容易、最熟悉、最安全[11]尋找依附關係的地方。若檢視 2019 年透過市話與手機電訪調查，推估全國 12 歲以上的上網人口達 1,898 萬人，而全國上網人數經推估達 2,020 萬，顯示 12 歲以上的個人，有超過九成會使用網路（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再根據 iWIN，兒少上網的主要原因包括抒發心情、與朋友聊天、上網交朋友等（于馥華、鄭芷妮，2018），值得思考兒少落入圈套的原因，是否因日常生活中無法得到滿足而被推到網路虛擬世界？

網路性誘拐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以兒少為被害族群的誘拐，是一種「循環式虐待」（cycle of abuse）的歷程（Sullivan & Beech, 2004 cited in Martellozzo, 2017），誘騙過程是加害人將受害人帶入秘密的性關係之中，性誘拐的特徵也包

[11] 這裡的安全是從兒少的認知出發，並非指網路真的安全。

含「掩蔽（shrouding）」，加害人通常先將被害人與同儕分開，誤導孩子感覺得到特殊待遇是因為他們是特別的，並且給予孩子所需求的愛，在加害人逐步算計之下，孩子一步步掉入陷阱之中，最後願意接受性虐待，其歷程通常包含七個步驟（O’ Connell, 2003；The National Centre for Victim of Crime, 2017；廖美蓮，2018；2019a），分別如下：

（一）鎖定被害人

運用交友軟體，掌握被害人的交友網絡形態與動態，利用一個或多個身份的帳號出現在被害人的友誼網絡圈內。

（二）增進信任與接觸機會

與被害者玩遊戲、提供接送、送禮物或特別的對待。

（三）扮演兒少日常生活傾訴者的角色位置

加害人通常利用「關係」操弄對方，並透過特定的方式滿足兒少的需求，使兒少漸進地產生加害人是唯一瞭解、知道她們想法的人的感受與認知。

（四）兒少從同儕團體與家庭關係自我孤立

將兒少與其他人分開、單獨接觸兒少，使其他人無法得知或目睹兒少受虐之情事。在特定情境下，當與其他成年人同處一室時，加害人仍可能性虐待兒少。

（五）營造秘密感作為利器

加害人可能透過信件往返、訊息或留言加強與被害人的特殊連結、強化關係，並且強調不要告訴任何人以免其他人不開心。若被害人揭露或告訴別人，加害人甚至會威脅要自殺、或傷害被害人、傷害兒少重視之人、親人等。

（六）以忠誠試探兒少，開始要求性接觸

藉由情感連結或其他手段建立權力後，加害人開始與兒少有身體上的接觸。一開始可能是漸進式的碰觸，如手臂圍繞肩膀、拍拍膝蓋等；逐漸地，加害人出現性騷擾的行為，打破禁忌，一步步突破孩子的戒心減低敏感，最後公然的碰觸、性虐待孩子。

（七）藉由性操控兒少

加害人藉由秘密來為維持關係，確保兒少不會揭露虐待行為。兒少可能受到加害人威脅、感到羞恥、擔心自己被指責，而害怕揭露虐待行為。

圖 3.1 兒少網路性誘拐的七步歷程
資料整理自 NCVC, 2017; NSPCC, n.d. ;廖美蓮，2018/2019

肆、性別化網路平台與父權共謀

目前，臺灣因研究不足，尚未掌握影像性虐待與性剝削的盛行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2013/2017）的估算，全球約有 35%的女性曾經歷過來自伴侶、朋友、家庭成員、熟人或陌生人的肢體暴力或性暴力，並且透過性犯罪的數據顯示網路性暴力事件存在明顯的性別化模式（gendered pattern），絕大多數的性暴力被害人為女性，而加害人多為男性。

科技女性主義（techno feminist）對網路性暴力採用社會建構主義觀點，認為科技是由日常生活人類行為及互動所形塑，並且也塑造人類行為（Hughes, 1986; Pinch & Bijker, 1984），因此數位科技不僅鑲嵌於社會發展，也纏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Adkins（1999）主張數位科技延續並加深社會橫跨種族、階級、性慾的不平等，並且影響女性（包含未成年女性）在網絡直播、自拍互拍、聊天室或平台遭受性暴力的經驗，不同國家、地區、社會經濟因素、教育、種族甚至不同性別，接觸通訊科技的途徑均不同（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16）。學者 Antonio & Tuffley（2014）從接觸途徑發現性別在科技中的差異與不平等，進一步指出，女性相較於男性擁有較少的途徑接近網路。本節從科技女性主義分析性別對數位科技的影響，以及科技如何成為觸媒，介入未成年人的情感生活。

一、科技的性別政治—強化男女性別不平等

網路性/別暴力是一種用來遏止女性在公共和網路領域發聲的法則，這些在網路世界中常見的女性經驗，實際上也代表並延伸社會中的女性每天所受到的性騷擾及性侵犯經驗（Cole, 2015）。科技建構的虛擬空間允許男性加害人運用更多手段，傷害個別女性使用者（以線上「親密伴侶」為名）（Lamphere & pikciumas, 2016），其中「網路性誘拐」廣泛用以指稱成年人運用網路科技與未成年人發展性虐待與性剝削關係的過程（Lorenzo-Dus & Izura, 2017）。

女性主義學者論述科技本身就是「陽剛的（masculine）」或「性別化的（gendered）」，其中 Wendy Faulkner（2001）提出七個造就科技性別化的原因：（一）科技設計者以男性為多數；（二）工作場所反映與強化陽剛氣質與技術能力之間的連結；（三）科技製造的產品通常分男女性別符號與強化男女差異的唯物論立場；（四）流行與文化的科技形象與霸權的陽剛氣質密切相關；（五）性別化的科技知識；（六）性別化的實作科技；（七）性別認同通常以科技為前提。學者 Faulkner（2001）指出科技場域為男流的權力空間與早期 Wajcman 的觀點（Wajcman, 1991）相近，科技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男性支配」且未察覺其「性別和其他特權」對形塑科技產業的影響，因此這個以男性為主流的網路性犯罪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忽視這些科技助長了針對女性的犯罪行為，或造成女性在網路受害的不利現象一直存在。由此可見，科技的設計、生產、使用，男性的權力位置及利益皆構成了網路性犯罪的性別化基礎，亦因此女性主義學者主張女性主義致力於探究並分析女人與科技的議題，關注科技帶給女性在性別關係中的不公義與迫害，藉以論證科技等於男性科技（Harding, 2001）。

然而，數位時代下的性別暴力並不完全是新事物，與過去不同的是，「科技助長的性/別暴力」被視為科技延續、掩蓋和加劇女性日常生活中原本就存有的各種形式的性別化暴力。至於通訊科技對網路行為的影響，將於下一節繼續討論。

二、通訊社交軟體之於網路行為—中性科技的不當使用

臺灣是一個數位網路化的社會，擁有即時隨處連網的環境。推動數位網路經濟活絡之餘，資訊安全防護也成為當前重要課題（TWNIC, 2019）。當青少年開始學習邁向獨立並漸漸與家庭關係疏遠之際，友誼關係成為青少年階段的重要生活重心（Fehr , 2000；引自楊天盾、熊瑞梅，2018）。MacKenzie & Wajcman 提出「科技的社會形塑（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概念（MacKenzie & Wajcman,1985）。學者指出，青少年生命歷程所發展的交友網絡，佔其一生中比重很大的生活經驗，關係到日後許多發展性的成就（吳齊殷、李珮禕，2001）。比方女性談「性」的社會文化建構，論述女性應該展現被動、閃躲、間接與隱蔽，但網路空間某程度帶給女性性解放（陳婷玉，2008）。由此可見，科技本身並非不好或是必須受到限制，而是我們必須理解各種科技如何用來鞏固傳統男女性別角色、規範和階級的工具，或做為邊緣化全體正義、和平和解放的工具（Powell & Henry, 2017）。承前，在兒少性剝削修法後的前幾年，由於未成年的性剝削案件有高達一半的比例屬網路科技的互拍自拍事件，又或是被害人本身是網路的使用者，但 213 類型案件目前在臺灣囿於一線實務工作者對網路世界的非接觸式性剝削或多或少仍存有迷思與未知，這些認知不足導致網路性誘拐議題被視為抽象的、無形的與不真實的。這解釋了為什麼兒少在現實和網路世界遭受到性虐待/性剝削，卻沒有通報—因為兒少未能意識到自身遭受性虐待/性剝削，甚或對網友要求自拍裸露照片與散播性私密影像，或與網友性愛視訊遭側錄就是網路性犯罪的基本概念都一無所知。

兒少上網時，隨時處於風險當中：暴露在不適齡的閱聽內容、接觸包含兒少猥褻影像的性探索產品、被網路騷擾和性簡訊的傳送/接收。性別化的網路文化致使兒少遭受仇女與厭女的粗暴語言、霸凌欺壓手法、色情暴力的「愛情」與充斥假訊息等，令被害者身心受到創傷，其中不乏未成年少女，如同 N 號房事件中的通訊社交軟體 Telegram 就是一種性別化的環境，加深現實社會中的性別化權力階級，與厭女文化（Schwartz & Neff, 2019）。在未經同意下傳送、交換、討論、觀看女性被害人的私密影像，這種行為本身正是男性和男性之間的有力連結，觀賞女體不僅物化女性，更是一種貶抑女性的行為。當青少年交友型態已「無網不行」，網路時代的到來與變化不容實務工作者忽略與低估，了解與辨識網路特性與風險，並支持上網的自律行為，建構網路禮儀，避免網路語言暴力所引發的衝突。另一方面，法律應規範相關網路業者自律的防治措施，

推動網路公民教育，發揮網路使用者的「網德」、「網格」，拒絕觀看來歷不明的性虐待、性剝削、性侵害與偷拍等影片[12]，也避免成為支持或參與發表性騷擾或歧視言論的網民。

伍、數位化性暴力的實務挑戰

一、數位時代下網戀與親密關係圖像的轉變

浪漫愛情是多數文化下的產物。浪漫愛跨越不同時代作為「愛情」論述的主流，歷經串流轉變，並非自然而然存在於社會（蔡宜文，2013）。高中或大學生對於愛情的圖像擺脫不了「男大女小、俊男美女、異性戀中心，或男主動女被動」的想像，加上網路色情資訊形式多樣且容易取得，使用者又具有高匿名性、高隱私性及高互動性等屬性，網路遂成為交友、網戀與尋求性愛的最佳途徑（陳婷玉，2008）。在網路認識、彼此聊天與分享照片，認識半個月後就相約出去，火速發生性關係的交友劇情，是現代年輕人常見的網戀模式。對經常使用網路的人來講，這種網路交友方式充滿刺激與危險，卻也有種約炮式一夜情的玩家味道。

現代性帶來親密關係的轉變（Giddens 著、周素凰譯，2003）。而現代社會女性的性別經驗也不再如以往傳統社會的那樣，處處受到父權式的保護與束縛，年輕女性在情愛中好奇、渴望、迷惑、幻想與靦腆，被網路交友應用程式的匿名性、便捷性以及即時性所化解，而較有機會採取主動角色，經營科技所創造的親密關係（Martellozzo, 2017），提供女性追求情慾自主及性解放的空間，為女性生活中增添人際信任的冒險與親密關係的刺激，這儼然是當前未成年兒少友誼網絡的互動與情感探索的模式。

線上交友的應用程式，利用網路的匿名性、即時性、迅速性以及方便性，拉近時空的距離，衍生出時下瘋傳的把妹達人（Pick-Up Artist, PUA[13]）—欺騙感情、誘拐未成年女性的手法，成為性剝削防制網絡成員感到陌生的新議題。這是一種基於性別刻板印象，在異性互動關係中強化男生必須扮演主動的角色，預設男性為「玩家」的性別遊戲（陳紫吟，2019 年 8 月 13 日）。一位曾經被 PUA 的女性，在明知遭到虛情假意欺騙、卻仍陷在愛情烏托邦遊戲中無法自

[12] 例如近日韓國的「N號房事件」。

[13] 大約在 20 世紀，美國發展出 PUA（Pickup Artist）的文化，中譯「搭訕藝術家」，又稱把妹達人（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3985849）。

拔：「儘管他騙了我，我還是很喜歡他。現在我很傷心，傷心不是因為被騙錢，是因為他真的不見了」（今天頭條，2020 年 3 月 10 日）。從故事中所描寫的女性受害人情緒反應推斷，這種騙財的行為建立在情感控制基礎上的，而情感控制是需要戰術的。此外，不難發現該名女性對於網戀的交往存在一種親密感受的單向情人關係。從這個例子檢視社群網站、聊天室、社交軟體中的性別對話與互動，我們應思考這些網路平台能否帶給女性情感賦權，抑或是建構另一個壓迫女性場域？是否再製父權體制中男性支配、女性從屬的權力關係？任何使用網路誘使女性、尤其是針對兒少的聊天活動，愈來愈引發實務工作者的關注與焦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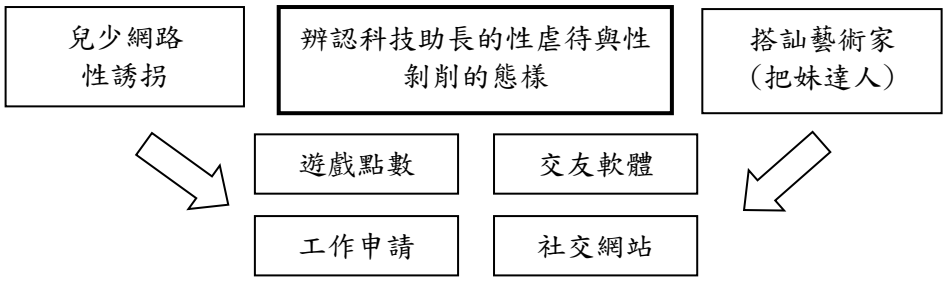

圖 5.1 辨認科技助長的性虐待與性剝削的態樣
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對影像性剝削兒少被害人處遇服務的建議

近年來兒少被害人性剝削態樣轉變，從修法擴大保護範疇以來，將自拍互拍及製作影像等亦納進受保護對象[14]，案量如前所述，已超出五成以上，加害人的犯罪途徑以使用網際網路為主流，實務工作者在提供服務過程須具備的專業知識確實超出原先的保護範疇（廖美蓮，2016；廖美蓮，2017；廖美蓮、陳逸玲，2017），值得我國社會工作教育端好好的審視課程與時代的鴻溝，加緊佈署。

臺灣兒少性剝削防制的工作架構，主要是學習與仿照英國的發展經驗。參照英國政府防制性剝削工作模式，從三方面加強性剝削防制工作，分別是預防（prevention）、保護（protection）、起訴（prosecution）（Harper & Scott，

[14]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即實務上簡稱 213。

2006）。預防旨在透過全方位的宣導與教育提高社會大眾與專業人員的對性剝削的警覺意識及相關求助資源；保護層面包含發展危險評估工具（SERA/SERAF, Sexual Exploitation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成立中央專責單位，推動網絡系統間的專業合作，以及強調成立國家層級研究中心的必要性，研究發展與資料分析兒少性剝削相關數據；起訴與定罪加害人是保護性剝削被害者最重要的方法，制定起訴兒童性剝削案件的工作指引，協助被害人指認加害人的罪行（廖美蓮、陳逸玲，2017）。過去二十年來，臺灣在兒少性交易防制的作法上，一律採隔離安置，採半保護半規訓模式（廖美蓮，2016）。臺灣後續邀請具實務經驗的學者參考英國性剝削低中高風險評估架構，研發一套在地化的兒少性剝削〈24小時必要安置指標核對表〉，針對兒少個人、家庭及社區外部系統進行綜合評估，協助實務工作者評估兒少再度遭受性剝削的風險程度（廖美蓮，2016）。2017年臺灣施行兒少性剝削新法後，這套指標已開始使用，中央也積極訓練網絡成員，倡權被害人指認與提告加害人，從社會結構面來面對網路性暴力的課題。然而囿於目前實務界對科技延伸性/別暴力以及網絡虛擬空間的資訊與瞭解有限，且不時陷於被害人對網戀的無知與渴望浪漫愛情之間的究責思維，忽視這些友誼網絡模式與浪漫情感圖像背後的性別政治結構因素，致使防制效果不彰。

兒少條例的修法與更名，不僅搭著兒權公約國內法化發展的新里程而掀起一股對推行兒童人權的重視，更揭示「兒童是權利的主體、不是被保護的客體」的重要性，至於工作者能否秉持此種專業眼光，避免服務模式讓受服務個案體現差異政治，讓同為性虐待受害人卻獲得差別的保護對待，仍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實務課題。某種程度上，性剝削少女在過去臺灣的兒童人權保護歷史中一直扮演她者（Othering）角色、或被保護系統邊緣化的對待（Thompson, 1993/1997/2001）。這個過程使得性剝削防制網絡中的個人或團體成員無法完全擺脫對性剝削兒少服務對象的「賤斥[15]身體」（abject bodies）圖像，包括另類的、反抗的，不被社會規範所承認的身體，以及被隱蔽的網路科技。

依照當前的性剝削工作架構與思維，確有需要安排第一線實務工作者接受

[15] 「賤斥」的概念是來自於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言的「那些我為了求生存而被永遠貶抑的」；同時，此概念也意指著不穩定、跨界與不在場（缺席）等概念，賤斥身體指的不僅是身體被拒斥或不在場，它同時也意指一種身體的媒介化再現（Parker-Starbuck, 2015: 69）。

不同於傳統的教育訓練，例如：關於性別與網路安全、網路使用素養的性別政治、數位科技助長的性/別暴力，讓實務工作者更體察與深化被害人的社會位置、生活結構以及身分年齡所造成的不平等。一線社工的處遇觀念能否翻轉、能否貼近兒童人權公約的保護意識與實踐精神，或視兒少性剝削被害人為兒童性虐待的保護個案，關係到兒少條例與兒權公約精神的實施效果與社會集體意識的改變速度，否則容易以行為問題究責兒少，反而不能明確標示加害人的加害事實，無意間落入檢討和指責被害人的陷阱。後結構女性主義批判語言結構仍然能夠充份反映出社工人員對於性剝削、性議題與性產業的負向情緒或偏見論述（Weedon 著、白曉紅譯，1993）。因此，研究者認為藉由實證研究基礎檢視兒少網路影像性剝削的內涵，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明確的定位，才能有效對受創傷的受害女性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陸、結論與建議

「每一支影片代表一個孩童被性誘拐或性剝削，任何成人的變態行為，都能摧毀兒少一生，極其惡質」（鏡週刊，2018 年 3 月 3 日），儘管兒少性剝削案件逐年攀升，社會民眾卻多未能知覺與辨識其嚴重性。據研究統計，影像散播中將近六成受害人被外漏名字、社交帳號及其他個人資訊等（Cyber Civil Rights Initiative, 2014），並且嚴重影響受害人的心理健康（Eaton et al., 2017），超過 9 成受害人產生情緒困擾，並有超過一半的人有自殺的意念（CCRI，2014），過去（或許現在也還是），集體社會經常要求或期待被害人最小化、容忍、必須接受，甚至加害人在特定允許網路虐待的社群中得到支持，諸如 N 號房 Telegram 群組聊天室、PTT、Dcard 與 PUA 教室網站等都充斥厭女的留言。網際網路無疑提供了精彩的學習、交流與社交的機會，與此同時，通訊與數位科技也衍生及助長各種形式的性暴力蔓延，甚至成為影像性虐待/性剝削的起始點，帶來的影響深遠且不可掌控，國際刑警組織成立的兒童性剝削資料庫（International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image and video database, ICSE），已擁有超過 270 萬張影像，並協助辨識全球約 23,500 位兒少被害人（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2020）。

兒少影像性剝削議題的服務挑戰接踵而來，面對這個具有時代性與結構性

的重大災變，其威脅力從數據來看，甚至超越新冠肺炎（COVID-19），差別只是這個性犯罪型態具有性別差異，被害人以女性（含未成年女性）佔多數，因此被女性主義者視為是性別暴力，網路世代中，無一倖免，不論年齡的女性都可能會遭遇影像性虐待/剝削的經驗。由此可見，極需防制網絡成員翻轉過往認為受性剝削少女偏差的論述（廖美蓮，2016），倡議去除少女污名，例如英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NSPCC）視兒少性剝削為性虐待的一種形式的專業眼光，認定兒少影像性剝削應放在更廣泛的性虐待範圍，同時應考慮性剝削社會問題發生的結構因素，相關單位必須避免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態度，而建議應主動提供跨單位合作模式直接協助受害兒少。由於兒少網路性誘拐的實證研究不足，實務經驗累積又單薄，本文企圖透過研究紀要的論文形式整理文獻，以探討兒童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的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的「兒少影像性虐待/性剝削」議題背後的需求，提出六點建議：

一、通常遭受網路性誘拐的兒少會誤將此性虐待視為網路戀愛關係或仍認定加害人為其男朋友[16]。因此，針對「網路性誘拐」的犯罪手法須深入探討、分析並拆解外，也建議落實情感教育，才能破除對浪漫愛情的想像與性別互動模式的刻板印象。

二、針對電訊業者制定適當的法律規範與重罰。目前我國法律針對網際網路業者以及網路犯罪者的刑責，都較許多歐美國家為輕，應發展有效預防網路安全防護系統的法律、措施與策略和介入時機，並在這些令人髮指行為發生時做出回應。

三、網安政策涵蓋廣泛，要杜絕影像的性別暴力與網路性誘拐陷阱，除加強查緝兒童性剝削影片工作外，還要加重懲處現在進行式的犯罪。最終還是要致力於消除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與厭女文化，不僅應對散播者提出嚴厲的刑事責任，對於數位性暴力共犯的旁觀者亦然。

四、網路科技發展迅速，傳統社會工作教育訓練並未觸及科技促進網路性暴力態樣，有必要提供科技與網路資訊的訓練，以增強實務工作者的科技知能，方能理解及回應被害人的需求與創傷，至於遏阻網路性暴力犯罪還是需要透過網絡的跨科際合作。

[16] 引用 Whittle, Hamilton-Giachritsis, & Beech, et al（2013）研究中受訪者的訪談內容。

五、網路安全問題，全球有責，期待檢警能對網路科技投入更多犯罪防治的研究工作，營造友善安全的網路環境。

六、建議一線社工深入理解影像性剝削被害兒少於性誘拐歷程中在關係上的需要，並從兒少家庭動力與主要照顧者的依附發展歷程切入，檢視兒少過去在依附關係中的經驗與受創，評估修復依附關係的可能性與處遇方法。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7]」與「兒童人權公約」兩大公約已分別於 2012 年與 2014 年國內法化，惟截至目前為止，兒少性剝削少女在保護系統內仍處於邊緣位置與處境，無法發展出有效改變社會文化對兒少性剝削被害人負面觀感的具體措施，不僅遭家長與社會排斥，也受到網絡專業人員的誤解與歧視。因此，本文希望兒少保護實務工作者能從當前主流價值的體制中，重新思考兒少影像性虐待/性剝削受害女性的保護機制與相關服務的架構，這是本文重要的呼籲，並藉此為我們的兒少人權倡議。

[17] 參考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針對對婦女的暴力行為提出第 12, 19 與針對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第 35 號一般性建議/意見。

參考文獻

ETtoday 新聞雲（2017 年 12 月 22 日）。《色情網站拜師拐幼女！惡狼專騙國中小裸女照…至少上百人受害》。取自：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1222/1078012.htm

三立新聞網（2016 年 10 月 26 日）。《「馬來狼」獵女童，台最小受害者才九歲！》。取自：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93205

三立新聞網（2017 年 5 月 22 日）。《國中少女裸照遭前男友惡意散布　崩潰跳橋自殺獲救》。取自：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255001

于馥華、鄭芷妮（2018）。〈兒少的網路世界真的跟你/妳想的一樣嗎？〉。《NCC News》，12(2)，9-15。

今天頭條（2020 年 3 月 10 日）。《PUA 五步陷阱、預防不良 PUA》。取自：https://twgreatdaily.com/_tMxxnABjYh_GJGVpGJN.html

白曉紅（譯）（1994）。《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原作者：Weedon, C.）。臺北：桂冠。（原著出版年：1987）

台灣展翅協會（2018 年 2 月 12 日）。《2017 年 Web885 網路諮詢熱線觀察報告》。台灣展翅協會。取自：http://www.smartkid.org.tw/dBlog/blog.asp?qbid=1537

吳齊殷、李珮禕（2001）。《友誼網絡對青少年心理健康之影響》，發表於「青少年生命歷程與生活調適」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台北。

兒童福利聯盟（2018 年 7 月 23 日）。《2018 年兒少交友 APP 調查暨網路交友離家現況》。兒童福利聯盟。取自：https://www.children.org.tw/news/advocacy_detail/2025

周怡霏（2020 年 3 月 25 日）。《N 號房受害者最小 11 歲 女淚崩訴事發經過》。東森新聞。取自：https://news.ebc.net.tw/news/world/202647

周素鳳（譯）（2003）《現代社會的性、愛、慾–親密關係的轉變》（原作者：A. Giddens）。台北：巨流。（原著出版年：1992）

柯慧貞、董旭英、李俊霆、周廷璽（2015）。《104 年學生網路使用情形調查報告》。教育部。

胡欣男（2017 年 7 月 31 日）。《準台大研究生是蘿莉控 網誘 121 名少女拍裸體不雅照》。中時電子報。取自：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31004234-260402?chdtv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2019）。《2019 臺灣網路報告》。資料檢索日期：2020 年 1 月 20 日。取自：https://report.twnic.tw/2019/assets/download/TWNIC_TaiwanInternetReport_2019_CH.pdf

婦女救援基金會（2017 年 10 月 21 日）。《【會後稿】數位時代中的性別暴力–以性私密影像外流為核心》。苦勞網。取自：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89450

陳易甫、陳時英、洪芳婷（2019）。《青少年自拍認知及行為調查報告》。台灣展翅協會。資料檢索日期：2019 年 7 月 10 日。取自：https://www.ecpat.org.tw/Default.aspx?ID=84&pg=1&d=4509

陳婷玉（2008）。〈解放？壓迫！網路色情聊天室中的兩性互動〉。《資訊社會研究》，14，223-260。

陳紫吟（2019 年 8 月 13 日）。《什麼是 PUA？按照攻略「把妹」有什麼問題？》。取自：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3985849

楊天盾、熊瑞梅（2018）。〈性別化的青少年友誼網絡與性別角色態度：單一性別與混合性別的班級脈絡〉。《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0，7-61。

廖美蓮（2016）。《24 小時必要安置指標及會談指引》。載於廖美蓮主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工作手冊〉（25-41 頁）。臺北：衛福部保護服務司。

廖美蓮（2018）。《影像性剝削兒少被害人處遇研究：發展反歧視社會工作實務模式》。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107-2629-H-031-001-（2018.8~2019.7）。

廖美蓮（2019a）。《影像性剝削兒少被害人處遇研究》。兒少網安及防制兒少性剝削國際研討會（2019 年 12 月 4 日），台灣展翅協會主辦，臺北：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廖美蓮（2019b）。〈走進層層密室－親密關係性暴力的定義態樣、盛行率與工作挑戰之文獻回顧〉。《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7，81 - 118。

廖美蓮、陳逸玲（2017）。《精進兒少性剝削被害人多元處遇工作計畫期中報告》。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委託台灣展翅協會。計劃編號：M05C2470，未公開。（2017.1~2017.12）

蔡宜文（2013）。《台灣異性戀男女青春羅曼史的性別分析》。清華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

衛生福利部（2020）。《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辦理情形》。資料檢索日期：2020 年 2 月 5 日。取自：https://www.mohw.gov.tw/dl-22382-147af6f7-116e-4ac3-83dc-04d12e8a8508.html

鄧桂芬（2019 年 7 月 17 日）。《網路使用調查近七成兒少常上 Youtube、愛奇藝或抖音》。聯合報。資料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9 日。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7270/3934200

羅真（2017 年 9 月 7 日）。《3 萬名兒少私密照外流警籲網路業者配合調查》。聯合報。資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29 日。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7315/2688105

鏡週刊（2018 年 3 月 3 日）。《全台藏 3000IP 散播兒童色情片揭 FBI 認證神探捕獲變態狼內幕》。鏡週刊。取自：https://today.line.me/TW/article/N3qYl1?utm_source=lineshare

Adams, S. (2007). Cyber-bullying: An emerging form of student aggression for the "always-on" generation. *Australian Educational Leader*, 29(2), 16-19.

Adkins, L. (1999). Community and economy: A retraditionalization of gende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6(1), 117-137.

Antonio, A., & Tuffley, D. (2014). The gender digital divid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uture Internet*, 6(4), 673-687.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3). *Personal safety survey***.**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Bates, S. (2016). Revenge porn and mental health: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revenge porn on female survivors. *Feminist Criminology*, 12(1), 1-21.

Bluett-Boyd, N., Fileborn, B., Quadara, A., & Moore, S. (2013). *The role of emer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experiences of sexual violence*. Melbourne, Australi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Boote, D. N., & Beile, P. (2005). Scholars before researchers: On the centrality of the dissertation literature review in research prepar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4(6), 3-15.

Brackenridge, C. H., Bishopp, D., Moussalli, S., & Tapp, J. (2008).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abuse in sport: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of events described in media repor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6, 385-406.

Bryce, J. (2010). Onlin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In Y. E. Jewkes & M. E. Yar (Eds.), *Handbook of Internet Crime* (pp. 320-342). Cullompton, England: Willan.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Chase, S.E. (1995). Taking narrative seriously: Consequences for method and theory in interview studies. In R. Josselson & A. Lieblieh (Eds.)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vol.13).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le, K. K. (2015). It's like she's eager to be verbally abused: Twitter, trolls, and (en)gendering disciplinary rhetoric.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5(2), 356-358.

Cyber Civil Rights Initiative , CCRI (2014). *Effects of revenge porn surve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ybercivil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4/12/RPStatistics.pdf (accessed, 6 January 2020).

Department of Justice, United States. (2013).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odge, A. (2016). Digitizing rape culture: Online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power of the digital photograph. *Crime, Media, Culture*, 12(1), 65-82.

Drouin, M., Ross, J., & Tobin, E. (2015). Sexting: A new digital vehicl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0, 197-204.

Eaton, A. A., Jacobs, H. & Ruvalcaba Y. (2017). *Nationwide online study of nonconsensual porn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CCRI Report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ybercivil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CCRI-2017-Research-Report.pdf (accessed, 6 January 2020).

ECPAT International and ECPAT Luxembourg (2016).*Terminology guidelin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from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sexual abuse*. Rachathewi, Bangko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icef.org/protection/files/Terminology_guidelines_396922-E.pdf

Faulkner, W. (2001). The technology question in feminism: A view from feminist

technology studie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4(1), 79-95.

Foucault, M. (1977).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Fox, C. & Kalkan, G. (2016). *Barnardo's survey on online grooming*. London, England: Barnardo's.

Freed , D., Palmer, J., Minchala, D., Levy, K., Ristenpart, T. & Dell, N. (2017).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multiple stakeholders. *P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46(1), 1-22.

Gillespie, A. (2002). Child protection on the internet: Challenges for criminal law. *Child and Family Law Quarterly*, 14 (4), p411-426.

Harding, S. (2001). Comment on Walby's "Against epistemological chasm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revisited": Can democratic values and interests ever play a rationally justifiable role in th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work? *Signs*, 26(2), 511-525.

Harper, Z. & Scott, S. (2006). *Meeting the needs of sexually exploited young people in London*. Retrieved from https://childhub.org/en/system/tdf/library/attachments/people_in_london_oct07.pdf?file=1&type=node&id=17972 (Accessed, 4 January 2020)

Hayes, S. & Unwin, P. (2016). Comparing the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the UK and USA: Insights for social workers. *Social* Work Review, 2016 (1), 27-39.

Henry, N., & Powell, A. (2015a). Beyond the sext: 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and harassment against adult wome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8(1), 1104-1118.

Henry, N., & Powell, A. (2015b). Embodied harms: Gender, shame and 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in cyberspa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1(6), 758–779.

Henry, N. & Powell, A. (2018). 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19(2), 195-208.

Henry, N., Flynn, A. &Powell, A. (2019a). Responding to revenge pornography: Prev-

alence, nature and impacts**.** *Report to the Criminology Research Advisory Council***.** Retrieved from https://crg.aic.gov.au/reports/1819/08-1516-FinalReport.pdf (Accessed, 04 February 2020).

Henry, N., Flynn, A. & Powell, A. (2019b).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Trends & Issues i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572, 1-19.

Hertlein, K. M., & Ancheta, K. (2014).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echnology in relationships: Findings from an open-ended Survey.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11), 1-11.

Howes, N. (2014). *Using the trauma model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sexual exploitation on children*. Newcastle Safeguarding Children Boar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scb.org.uk/sites/default/files/Using%20the%20Trauma%20Model%20to%20Understand%20the%20Impact%20of%20CSE%20on%20Children.pdf (accessed, 15 April 2019)

Hughes, T. (1986). The seamless web: Technology, science, etcetera, etcetera.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6(2), 281-292.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2016).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publications/misr2016/MISR2016-w4.pdf (Accessed, 15 October 2019)

Jeglic, E. L. & Calkins, C. (2016). *Sexual violence: Evidence based policy and prevention*. New York, NY: Springer.

King, R. (2011). Onlin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s vehicles for sexual violence: Challenges for police. *Australasian Policing,* 3(1), 24-30.

Klettke, B., Hallford, D., Mellor, D. (2014). Sexting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4, 44-53.

Kloess, J. A., Beech, A. R., & Harkins, L. (2014). Online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Prevalence, process, and offender characteristic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5, 126-139.

Lamphere, R. & Pikciumas, K. (2016) Sexting, sextortion, and other internet sexual offenses. In J. Navarro, S. Clevenger & C. Marcum (Ed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intimate partner abuse, technology, and cybercrime* (pp.141-156). North Carolina, Canad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Lorenzo-Dus, N., & Izura, C. (2017). “Cause ur special”: Understanding trust and complimenting behaviour in online grooming discou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2, 68-82.

MacKenzie, D., & Wajcman, J. (Eds.). (1985).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How the refrigerator got its hum*. Milton Keynes,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Marganski, A., & Fauth, K. (2013). Socially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dating: A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s in the modern, evolving technological worl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3, 357-377.

Martellozzo, E. (2017). Online grooming: children as victims of online abuse. In E. Martellozzo & E. Jane (Eds.), *Cybercrime and Its Victims* (pp.108-128). Oxon, England: Routledge.

McAfee. (2013). *Lovers beware: Scorned exes may share intimate data and images online*. McAfee. Retrieved from http://www.mcafee.com/au/about/news/2013/q1/20130204-01.aspx (Accessed, 03 February 2020).

Melrose, M. (2013). Young people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M. Melrose & J. Pearce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related trafficking* (pp.9-23).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Mitchell, K. J., Finkelhor, D., Jones, L.M., & Wolak, J. (2012). Preval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youth sexting: a national study. *Pediatrics*, 129, 1-8.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NSPCC. (2015). *Grooming: What is Grooming?* London, England: NSPCC.

O' Connell, R. (2003). *A typology of child cyber sexploitation and online grooming practices***.**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Preston. Retrieved from: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898c/0e9791e5d227dd875129ca05cf7cae08d4c4.pdf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nited Kingdom. (2013). *An overview of sexual offend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Ministry of Justice, Home Office & the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London, England: Home Office.

Parker-Starbuck, J. (2015). Cyborg returns: Always-already subject technologies. In S.

Bay-Cheng, J. Parker-Starbuck & D. Z. Saltz (Eds,), *Performance and media: Taxonomies for a changing field* (pp. 65-92).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atrick, K., Heywood, W., Pitts, M. K., & Mitchell, A. (2015). Demographic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six sexting behaviors among Australia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xual Health*, 12(6), 480-487.

Pinch, T. J., & Bijker, W. E. (198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4(3), 399-441.

Powell, A. & Henry, N. (2017). *Sexual violence in a digital age*. London,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owell, A. (2010a). Configuring cons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unauthorized sexual images and sexual assault.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3(1), 76-90.

Powell, A. (2010b). *Sex, power and consent: Youth culture and the unwritten rules*. Melbourne, Austral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ultz, N. R., Jr. & Moore, D. (1989). Further reflections on loneliness research: Commentary on Weiss's assessment of loneliness research. In M. Hojat & R. Crandall (Eds.), *Loneliness: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p.37-40). Newbury Park, CA: Sage.

Schwartz, B., & Neff, G. (2019). The gendered affordances of craigslist "New-in-Town Girls Wanted" Ads. *New Media & Society*, 21 (11-12), 2404-2421.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NTERPOL (2020). *International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databas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terpol.int/Crimes/Crimes-against-children/International-Child-Sexual-Exploitation-database (Accessed, 21 March 2020).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Victim of Crime, NCVC (2017). *Grooming dynamic of CSA. Reporting on child sexual abuse*. Retrieved from http://victimsofcrime.org/media/reporting-on-child-sexualabuse/grooming-dynamic-of-csa (Accessed, 21 December 2017).

Thompson, N. (1993/1997/2001). *Anti-discriminatory practice* (3rd Ed.). Basingstoke,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2015).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on the abuse and exploitation of childr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Cybercrime/Study_on_the_Effects.pdf (Accessed, 01 February 2020).

Wajcman, J. (1991). *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Weiss, R. (1973/1982/1989). *Loneliness: The experience of emotional and social isolation*. Cambridge, England: MIT Press.

Whittle, H., Hamilton-Giachritsis, C., & Beech, A. (2013). Victims' voices: The impact of online grooming and sexual abuse. *Univers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 59-71.

Whittle, H., Hamilton-Giachritsis, C., Beech, A., & Collings, G. (2013). A review of online groom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ern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8, 62-70.

Wolak, J., Finkelhor, D., & Mitchell, K. J. (2012). How often are teens arrested for sexting? Data from a National sample of Police cases. *Pediatrics*, 129 (1), 4-12.

Wolak, J., Finkelhor, D., & Mitchell, M. (2011). Child pornography possessors: trends in offender and case characteristics. *Sexual Abuse*, 23, 22-42.

Wolak, J., Mitchell, K. J. & Finkelhor, D. (2001).Close online relationships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37:147, 441-455.

Woodlock, D. (2016). The abuse of technology i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talk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3(5), 584-60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02).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42495/9241545615_eng.pdf;jsessionid=665B7D20A2BFCF6D2102CC4BF2255606?sequence=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3). *Glob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revalence and health effe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non-partner sexual violenc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violence/9789241564625/e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7). *Strengthening health systems to respond to*

women subjected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or sexual violence-A manual for health manage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9489/9789241513005-eng.pdf.

Yar, M. (2012). Crime, media and the will-to-representation: Reconsidering relationships in the new media age. *Crime, Media, Culture*, 8(3), 245-260